

4/709/27

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集)

秦皇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六月

前 言

《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今天与读者见面了，它将为文史的海洋增添一朵浪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波助澜。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是人民政协总任务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秦皇岛市政协恢复工作以来，重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和领导的部署，今后将已征集或新征集的文史资料，进行筛选和研究整理，陆续出版《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

秦皇岛地处京畿，这里有北方的不冻良港，有避暑胜地北戴河和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一关”，所辖四县昌黎、抚宁、卢龙、青龙，都有悠久的历史，文物古迹众多，史料非常丰富，将成为我们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永不枯竭的源泉。

《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以征集近、现代史中的政治、军事、文教、科技、工商、民族、侨务、社会等方面的资料为主，欢迎熟悉这方面史料的市、县、区政协委员、各界人士、旅居国内外的秦皇岛人士，以及与秦皇岛有各种关系、了解秦皇岛某方面情况的同志和朋友，为本选辑积极撰稿。

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和出版，可以为修史、编志提供可借鉴的文史资料；还可做为我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史读物，了解过去，认识现在，从而激发他们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的感情；特别是对青少年，可以做为乡土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包括政治军事、人物传记、工人运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史料，计十八篇。目的是以出版选辑促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使我市的文史工作出现新局面。因编辑水平所限，难免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秦皇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集

目录

李大钊与五峰山·····	董宝瑞 (1)
朱启铃与北戴河公益会·····	杨丙田 (11)
白眉初传略·····	张艾蔓 (31)
丹青妙手许碧山·····	孙树峰 (139)
皮影艺术家——李秀·····	朱玉石 (142)
1949年初秦申之间南北通航易货往来纪实·····	黄景海 (21)
山海关铁工厂罢工始末·····《山海关桥梁厂志》编委会办公室	(51)
两道彩虹连生记·····	蔡厚祈 (61)
秦皇岛海关概况·····	李桂林 张万秋 (74)
耀华工人复工斗争纪实·····	李修毓 (100)
燕山春雷·····	王荫生 刘忠厚 肖 兵 (107)
山海风云·····	市委党史办公室 (109)
秦皇岛市山海关第一中学校史·····	高俊峰 (112)
(校友阮务德烈士传略)·····	樊锐峰 (119)
日本华北陆军医院的建立及其经过·····	张诚藩 (129)
西河南庄事件·····	史向荣 (131)
山海关京剧票房的历史沿革·····	郝三进 张禾田 (145)
“莲花石公园”始建与构成·····	张诚藩 (156)
秦皇岛市大事记稿 (1840—1948) ·····	康 群 (158)

李大钊与五峰山

董宝瑞

我市昌黎县境内的五峰山，是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生前最为喜爱的名山胜境，也是他从事重要革命活动，并借以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缉捕的地方。

—

七十多年前，李大钊在《游碣石山杂记》（载1913年11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六期）一文中，开篇便写道：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却装昌黎，游性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竞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

这里说的是其家乡的地理位置，及其首次游览碣石山之行。

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是个沿海村庄，其地一马平川，但村北偏东七十华里开外的昌黎县城迤北，却有着古今有名的碣石山。碣石山为燕山主峰伸向东南海边的突起支脉，由近百座峰峦组成，跨越昌黎、抚宁、卢龙三县境界。其主峰仙台顶（俗称娘娘顶）海拔六百九十五米，山势险峻奇特，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相传为历史上的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巡行观海、刻石纪功之地。晴天朗日，碧空如洗，立足大黑坨村头北望，那碣石山如屏障横列的

群峰清晰在目，显得既悠远而又神奇。从小生活在海边平原上的李大钊，对朝夕可见的碣石山非常神往。

李大钊长大到天津上学，有了在昌黎上下火车的机会。他第一次游览碣石山，没有登主峰仙台顶，与友人“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西五峰韩昌黎祠当时为游览碣石山的第一去处。五峰山，为碣石山群峰的一支。它位于仙台顶迤东，由两组巔连交错的十座山峰组成，按方位分称为东、西两个五峰，由于山势都很奇丽险要，均被列入古碣石的十大名胜，一名“东峰耸翠”，一名“西嶂排青”。五峰山临海很近，景色宜人。西五峰半山平台上筑有为纪念唐代文学家韩愈而建的韩昌黎祠（亦名“韩文公祠”），在京东一带久负盛名。古人曾留下“北平山水古称奇，五峰兀然当昌黎”（清·龚应霖《游五峰山》）、“北平山水称五峰，五峰屹立摩苍穹”（清·彭延祉《登五峰山望海》）等诗句，赞美这里的山光水色。五峰山，数百年来一直被列为古北平郡的名山胜境，为临碣石必游之地。李大钊等人首次来昌黎，要进山游览，当地人引导他们先去五峰山韩文公祠“一憩”。当天，正赶上“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这样的天气是登不得碣石绝顶的，即便登上去也只见云雾，无任何胜景可览。

李大钊一行人冒雨游览五峰的情景，近乎神奇。据《游碣石山杂记》记载，他们“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经过“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而不知”的“马家山湾”后，“陟一峰巔，徘徊不知何往”。这时，他们“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缈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正因为有此种奇遇，李大钊在事隔几年后回顾说：“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马家山湾为由昌黎县城经杏树园村，去西五峰所经的最后一个小山村。山村座落在一条山沟里，有几户人家，均姓马，故名“马家山湾”。文中所说“陟一峰巔”，是指马家山湾村东北的一座山岗。山岗之北即为五峰山，但若去位于半山腰的韩文公祠，须下一道山沟，跨涧而上，而山

道隐在山岗的东北角崖壁下，平常就极难找寻，雨天山中云遮雾裹，就更难寻找了。但尽管山岗与韩文公祠相距还有数百米远，因山中有回声，大钊等人高声呼喊，守祠人则完全能够听见。据李大钊在文中提及，和他同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的一共三人，分称“子衡”、“守恒”、“际青”。到李大钊几年后再来游览时，旧游已天涯零散。“子衡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近年笔者多方查访，仅从乐亭县档案馆查得“守恒”。“守恒”为张永德的字。张永德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籍学友，毕业后历任热河高等法院院长、京师地方审判厅检察官等职）。

李大钊第二次游览碣石山，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当时，他已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准备去日本留学。出国前，他特意邀请友人子默一同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数日。就在这次游览以后，他写下了《游碣石山杂记》一文。在这篇游记中，他除回顾了第一次进山游览的奇遇外，还详细记载了这次游览的所见所闻，一一历数了五峰山、韩文公祠、范公洞、水岩寺、桃源山等处佳美风光及有关趣事轶闻，并摘录了范志完、尤侗、崔树宝等明、清时代的文人墨客赞美碣石、五峰山景的诗文。关于五峰山和韩文公祠，李大钊在这篇游记中叙述得尤为详尽。

五峰山在昌黎北十二里，仙人顶迤东，群山矗立，峻岭怪石高撑天际，五峰环峙，势若列屏。自东向北、西历数：曰望海，曰锦绣，曰平斗，最高曰飞来，曰挂月。昌黎祠在山腹，建自明崇祯年间，本圆通寺旧址，积石叠起，扩其地基，数筑庭宇，盛植花木，于虚无缥缈间，万树森森，拥空中楼阁。凭垣一眺，东南天海一碧，茫无涯际。俯视人寰，炊烟树影，渺然微矣……

文中“昌黎祠”即韩文公祠，始建于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主建人为明末的山石道（后升任山海督师）范志完。范志完是河南省虞城县人，崇祯四年进士。他于建祠那年春天到五峰山游览，

说该地“天生文笔峰”提议增修一座韩文公祠（昌黎城里早在洪武初年就修有一座韩文公祠），并在峭岩上令人刻下他手书的“泰山北斗”、“五峰环翠”等字。范志完明为修建韩文公祠，实为自己和自己的顶头上司朱国栋（山海巡抚）建立生祠，“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李大钊语）。在韩文公祠正殿中为他自己和朱国栋塑配象、立牌位仍嫌不足，他还令昌黎县知事蒋三捷在韩文公祠旁给他修了一座范公洞。到清后期，圆通寺荒圯，当地人于一八六二年（同治十三年），在韩文公祠正殿迤东加筑台阶，修起一座同正殿规模不相上下的客厅（当地人称“花厅”）。客厅两明一暗，里屋靠窗垒有火炕，备有被褥，供游人留宿；外屋明窗净几，桌椅齐整，为游人小憩之处。李大钊这次山居五峰，就住在客厅里屋。现在客厅与正殿，及守祠人居住的两间耳房，均于解放前夕拆毁，但建筑遗迹尚明，房基仍在；此外，李大钊当年抄录过的刻有范志完的《游水岩歌》的石碑（原嵌于客厅北墙），还被完整地保存着，没有受到损坏。

二

李大钊第三次到五峰山旧地重游，已是一九一七年了。此时，他由日本回国整整一年了，正在北京担当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每天忙于伏案写作。这年五月六日，他“回里看细君病”（《白坚武日记》）语。在回乡看望生病的妻子的途中，路经昌黎时他逗留了一天，“请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入碣石山”（《旅行日记》）。这一天，他先游览了碣石山里的游春胜地隐仙庵，后到五峰山韩文公祠看望了阔别将近四载的守祠人刘克顺，并登望海峰观海，只因春日风沙弥漫，天气不甚清明，没有看到“地尽忽惊天水合，怒涛千尺腾蛟龙”之景。关于这一天的游历，他全写在当晚宿在大德增客棧时写的《旅行日记》（载当月九至十一日《甲寅》日刊）中了。隐仙庵在昌黎县城西北六华里处，建于清光绪年间，其地山峰环拱，秀丽天成，为当地春天踏青时游人麋集之地。现隐仙庵已毁，仅遗有断壁残垣。刘克顺为韩文公祠雇的守祠人。李大钊几次游览，都是他接

待的，后来与李大钊结成了“忘年交”，当时老人已六十九岁。大德增客栈在昌黎车站南站外，为乐亭人开设。李大钊路经昌黎，一般都在这家旅店落脚。

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将五峰山韩文公祠择为自己避暑之地。据当年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的张申府回忆，“每年北大放暑假，守常同志照例要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忆守常》）。张申府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赴法国任教。他从一九一八年始与钊同志共事三年，曾两次代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一九二〇年暑假，钊同志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回了一次家乡，为的是把家眷接到北京来住。

李大钊一九一八年夏天到五峰山避暑，没有留下游记类的文字记载。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结下的同窗密友白坚武，在这一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载说，“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这三首白话诗统称《山中即景》，第一首为：“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第二首为：“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处；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第三首为：“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前两首发表在当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第一首改为五言诗：“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第二首也有改动：“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这几首诗，写的是五峰山景色，并写于五峰山上。此外，白坚武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抄录有李大钊另一首题为《悲犬》的诗：“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这无疑写的是守祠人刘克顺养的看家狗，对他前后两次进山，由生到熟的不同态度。从《悲犬》诗中可以推知，那年放暑假李大钊由北京乘火车返回家乡，在昌黎下车时，先进了一趟山，与刘克顺定下了山居的日期及有关事宜，即诗中说的“初入山”；回到大黑坨住了几天后，他由家乡来到五峰山上开始了避暑生活，即诗中说的“既入山”。这年八月中旬，李大钊在韩文公祠山居。他给白坚武的信与诗稿也是寄自五峰山。

这年暑假，对李大钊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夏天。当时，他已发表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质有了初步认识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李大钊》一书的作者张静如、马模贞语），他到五峰山里避暑，不仅仅为了休假，是为寻找一个幽静的环境，潜心研究有关十月革命的资料，探索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找出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李大钊在五峰山上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就在这年夏天，他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一个新的纪元，新的世界。《山中即景》诗就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他写的这一组白话诗，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切感受，也表现了一种轻松快慰的美感，好象刚刚脱却一个闷郁窒息的世界，突然踏进一个清新壮美的天地一般。没有强烈的崭新的感受，是难以吟诵出这么豪迈奔放的诗句的。

一九一九年夏天，李大钊第五次到五峰山避暑。这次他是带着长子葆华一同上山的，一进山就投入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中去了。他先集中全力写出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了胡适在其《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的种种谬论，公开声明他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表现了一个革命先驱者的大无畏气概，及自己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态度。接着，他抓紧时间撰写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下山时基本脱稿。这篇文章长达两万六千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十一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上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一步广泛和深化。

关于李大钊在五峰山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地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当韩文公祠来了游客时，大钊同志便到韩文公祠庙后的峭壁平台上，在一块天然石篷下读书写字。现在，人们都把那块石篷亲切地称为“大钊读书石”。

李大钊第二次到五峰山避暑，写下了《五峰游记》，发表在当年

八月三十日出版的《新生活》第二、三两期上。在发表这篇游记时，他启用了后来一直很喜爱的笔名“孤松”。“孤松”这一笔名，取意于五峰山绝顶上一棵独立不群的劲松。五四时代广为流传的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孤松”即指被称为“北李”的李大钊这一笔名。除《五峰游记》外，李大钊还写出了《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白话诗，和《致若愚、慕韩信》、《从五峰致郁疑信》等信件。这些诗和信都写得非常有趣，表现了他轻松愉快的山居生活，及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中陶冶自己性情的情景。

这次五峰避暑，给他感触最深的是由五峰下山返回大黑坨的路上。当时昌黎一带正闹瘟疫，许多人被霍乱夺去了生命。在回乡路上，大钊看到到处是新坟，感到被死的现象几乎包围了，便思索起“死”的本质，认识到死和生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可恐怖的。回到北京后，他获知军阀政府的官僚们对这次瘟疫流行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救应措施，反而煞有介事地向国际卫生组织封锁消息，非常气愤，提笔写了一则题为《秘密……杀人》的随感录，悲叹：“中国政府什么事都秘密……这秘密二字下，不知又添了多少冤魂！”进而发出责问：“瘟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不久，他对自然与人生的认识也有了升华，在一则题为《牺牲》的随感录中写道：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在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是五峰山展现出来的“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在他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整个身心都被自然界中崇高的美深深感染了，从而激发了心灵中的崇高的美，并使这种美达到了一个理想境界。

三

一九一八年暑假结束时，李大钊将妻子儿女带到北京居住；一九一九年放暑假时，全家人由滦州（县）下火车取道滦河返回家乡后，到开学时夫人赵纫兰没有随行回京。一九二〇年清明节到来之际，李大钊由北京旋里一行，路经昌黎到城外踏青，见到一些妇人在上坟，凭吊去年夏末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亲人。他发现上坟的人都在哭诉死者抛弃生者去了，留下生者在世上继续受苦，不由在心中叹道：“那山前后的野哭，不是死亡的悲声，乃是生活的哀调。”（《自然与人生》，载1920年6月20日出版的《新生活》第三十八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下旬，他乘暑假尚未结束时，由北京回原籍把家眷又接到北京，并从此把家定居在京华。

李大钊最后一次登临五峰山，是一九二四年春天。这一次来，是作政治避难，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缉捕。

这一年二月底，李大钊由广州参加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北京，担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北方党组织的活跃，引起了吴佩孚把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惶恐，在五月二十日前后，军阀政府突然下令，要逮捕李大钊等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通知有关同志后，剃掉引人注目的八字胡，扮成生意人模样，由葆华陪伴，搭京奉夜车连夜离开了北京；次日凌晨到达昌黎时，父子俩没有惊动城内的任何熟人，径直进山住在了韩文公祠。就在他们父子俩离京的那天晚上（一说第二天晚上），警察总监王怀庆派便衣军警到李大钊在北京的住宅（铜幌子胡同甲三号）进行了搜捕。警察搜捕的第二天，李大钊的在京家属乘火车回到了乐亭老家。紧接着，警察又由北京追到乐亭大黑坨搜捕。军警们去大黑坨必由昌黎下火车，回程由昌黎上火车，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李大钊就隐匿在昌黎城北十二里的一座深山古祠里。五峰山，在军阀政府通缉李大钊的关键时刻，为掩护伟大的革命先驱立了大功。

李大钊这次在五峰山上住有半个多月时间，每天在祠堂的客厅里

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六月上旬,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送通知的人是于树德(字永滋)。于树德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下两届同学,他在天津上学期间参加了辛亥滦州起义,后到日本留学,一九二一年回国后在天津任教。一九二二年,李大钊介绍他以新中学会代表的名义,去莫斯科参加了远东民族代表会议,由苏联回国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一月,他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同被大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回到北京后,一同担任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于树德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后,先到乐亭大黑坨寻找大钊同志的下落,后在大钊的外甥希增带领下,来到五峰山韩文公祠,见到了大钊同志。于树德在给李大钊送来紧急通知的同时,还给他带来了夫人赵纫兰写的一封信家书。在信中,赵纫兰与他商量,她打算给白坚武写一封信,想请白坚武设法把通缉令撤消。当时,白坚武在吴佩孚手下任总参议,假如他肯出面说情,对李大钊的通缉令是有可能撤消的。但是,李大钊不同意夫人这样做。在告别五峰山的夜晚,李大钊在韩文公祠草修了一封家书。在信中,他对赵纫兰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胞兄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在信中,他还回顾了他去南方期间,反动当局对家里进行的一系列迫害,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住他的。他把统治者形象地比作一只纸老虎,说纸老虎的寿命是不会长的,它是禁不住冲天的革命烈火燃烧的,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更没有什么可怕。在信中,他还提到自己在五峰山上,为患肺炎夭折的幼女钟华写的一首长诗,对夫人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替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信的最后,他充满胜利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

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暂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李大钊告别五峰山时，和由北京来避难时一样的打扮。他没让葆华与希增同行，是一个人独自走的。几天后，他会同其他代表，一起由北京出发，转道哈尔滨，从满洲里越过国境去了苏联。这年入冬时他才回国，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京发动政变，撤消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从一九二四年冬到一九二七年春，他一直坚持战斗在北京城，直至牺牲也没回过家乡，没再到五峰山避难。

李大钊由五峰山登程去苏联开会，得到了他的同乡好友杨扶青的掩护和资助，杨扶青（1891~1978年）是乐亭县杨岗子村人，由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水产所留学。在日本他加入了新中学会，与周恩来同志结为好友。一九一九年他由日本学满回国，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在昌黎县集股开办了新中罐头公司，生产“赤心”牌各种罐头，产品畅销于东三省。李大钊与杨扶青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熟识，并结为同乡好友的。杨扶青虽然没有参加革命斗争，但也很同情和支持革命。李大钊路经昌黎时，不止一次到过新中罐头公司。据有关人回忆，杨扶青掩护过李大钊同志，并以经费帮助过党。据乐亭人王芳田生前回忆，李大钊在去苏联途中转道哈尔滨时曾对他说过，他从北京出发来哈尔滨时，曾转道昌黎，住在杨扶青开办的新中罐头公司，当他问李大钊出国的经费足不足时，李大钊说已有准备，临来前杨扶青从昌黎新中罐头公司已汇哈尔滨五百元银币（见《回忆李大钊》书中《李大钊在哈尔滨》一文）。

李大钊同志在其一生中，至少有七次登临了五峰山，而其中有四次是山居，其他三次都与革命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次是乘避暑在这里进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拓荒、播种工作；一次是作政治避难，并由这里的志士仁人掩护、资助，启程去了苏联。由此，可以说五峰山是李大钊宣传革命，向敌人隐身作战的阵地。一九一九年夏天，他在五峰山撰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都是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我党诞生的历史中占据显著位置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在五峰山的经历还是李大钊从事新文

学创作的源泉。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写下《游碣石山杂记》、《旅行日记》、《五峰游记》、《自然与人生》等有关碣石山、五峰山及昌黎的游记、散文，写下《山中即景（三首）》、《悲犬》、《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新诗，占据他记事性散文和白话诗创作的大部；同时，他还在五峰山上写了一些书信，这些书信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此外，五峰山还是陶冶李大钊思想、性格和情操的地方，是激发他的爱国热情，奋发向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斗争，不惜牺牲生命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李星华在著书回忆她的父亲与昌黎五峰山的关系时说道：“昌黎五峰山，几乎成了父亲的第二故乡。”这话说得是很贴切的。

朱启钤与北戴河公益会

杨丙田

（一）

朱启钤（1871~1964），字桂辛，号夔公，人称朱桂老，贵州开阳人。一八七一年生于河南信阳，幼年丧父，寄居湖南长沙外祖父家，青年时随姨夫瞿鸿禨（晚清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在四川做下级官吏。辛亥革命前，曾先后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京师巡警厅厅丞，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局北段总办等职。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职。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任大典筹备处长。袁死后，朱作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次年被赦。民国十年（1921），朱因公前往巴黎，见到徐特立等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濒于饥饿，立即慨然拨赠国币五万元。一九一九年二月朱启钤受徐世昌总统委派为北方总代表与以唐绍仪为代表的南方

军政府在上海举行有名的南北议和会议，由于种种原因，谈判破裂。朱从此退出政界，致力于经济活动和古建筑古文化的研究。经办中兴煤矿公司（山东枣庄）、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在北京组织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的研究，培养了一批古建筑人才。朱在任内务总长期间，曾辟北京社稷坛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朱收集丰富，潜心著述，著有《丝绣笔记》、《女红传征略》、《存素堂丝绣录》、《贵州碑传记》、《螭园文存》等著作；并在北戴河海滨发起创办了地方自治公益会，组织领导了该会对北戴河海滨的建设与开发。

建国前夕，朱启铃先生应周恩来同志的邀请，从上海迁往北京（是周总理派朱的外孙章文晋专赴上海迎接到京的），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到京后。他曾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张叔诚、黎绍基等常务董事一起把已经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内地加入祖国的海运事业。他还向国家捐献了大量明代文物，包括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岐阳王（岐阳王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世家文物五十六件，其中颇多珍品，仅“张常丰画像”一件，美国人福开森就曾想以三万美元的价钱购买，遭到朱先生的拒绝。他还参与了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工程设计等工作。解放后，朱历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两届委员等职。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三岁，经周总理批准，其遗体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二）

北戴河海滨正式有外国人居住是从光绪十九年（1893）开始的。在此以前，海滨“乃一荒僻乡村”，“交通不便，文人学士罕至其地，是以不甚著闻于世”^①。光绪十九年，筑津榆铁路时，英国工程师金达勘测路线来至金山嘴一带，见其沙软潮平，气候宜人，实为宝地，于是“纵愿供职铁路之华人杨季琳等大举购地”。金达等人又在京津一带极力渲染，所以各国传教士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才纷纷来海滨购地建

屋。最早在海滨购地筑墅的是英教士史德华和甘林。他们修建的只是休养用的别墅，但却引起了一向闭关自守、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一片恐慌，以为帝国主义要在海滨修建军港，即派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就近调查此事。结果是北戴河海湾水浅，不宜停泊军舰，这场虚惊才算了结。为了防止外国人在海滨继续侵山占地，便由张翼买下了莲蓬山一带四座山的地皮。

随着外国避暑人士的逐渐增多，清政府感到无力抵制，才不得已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式辟北戴河海滨为避暑区，隶属抚宁县管辖。同年，由北洋大臣委派津海关道李岷琛、候选道王修植，开平矿务局总办周学熙、海关税务司杜维德等人勘定了避暑区域，规定：

“戴河以东至金山嘴沿海，向内三里，及往东北至秦皇岛对面，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杂居。”这实质上是清政府一种消极的开放政策，所谓消极是因为它没有主动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为我所用”，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的。

随着清政府的这一消极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及其家眷从京津和各地来海滨避暑，最多时达六十个国家。至民国六年（1917）公益会成立前，在海滨的外人房舍已建有一百余所，来海滨避暑的外籍人已近千人。这些外籍人为了在海滨站稳脚跟，纷纷以宗教名义各自结成团伙，并彼此划分势力范围，共同对付中国人和中国当局。成立最早的是以英美传教士为主的“石岭会”，势力范围东至刘庄，西至火车站（现海滨新华书店一带）。继之而起的是以美、英、德传教士为主的“东山会”，势力范围在东山一带。其它还有什么“庙湾会”、“灯塔会”、“夏令会”、“基督教会”等等。其中会员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是“石岭会”。该会除负责本区域内的道路、卫生、救生、房屋建筑、冬季看守等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为外国人服务的公共事项外，还以各种名义侵吞当地人民的土地，并“转赁于会友”。他们通过领事裁判权，以每亩地五角钱的低租永租居民土地，同时还插手解决本区内中国居民的民事纠纷，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致使刘庄、东山一带成了国中之国，园中之园。这些所谓的“帮会”实际上都是欺压中国人民的俱乐部，充分暴

露了这些外国侵略者企图霸占北戴河海滨的野心。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的一些上层人士生活逐渐欧化，其中有一部分人每年夏季来海滨避暑。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国侨民和德军的遣返，他们“纷纷售屋而去”，致使联峰山一带房地空闲。中国上层人士、地方豪绅、官僚资本家乘虚而入，填而充之。这些人各自为政，群龙无首，在结成团伙的外国人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相形见绌。那些洋教士、有地位的外国人在往往对之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朱启钤先生一九一六年第一次来北戴河海滨就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为了“争主权、拒外人”，大好河山“恐复为有力者所攫。”^⑤他针对“各国外侨复纷组织团体、戕戕焉有喧宾夺主之势，行政官厅鞭长莫及，一切放任自流”^⑥的现象；针对当时“县官征其租税，理其诉讼，他非所问，迨设警察，只以保护外侨为职，平时对待外人奉令唯谨，石岭会戕戕侵行政之权，乃行政官放弃不问”^⑦和“在外人心目中，殆以为我不能自治，宜取而代之”^⑧等问题，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在民国七年夏（1918）开始号召在海滨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同年八月，酝酿筹备并草创会章。次年六月，经内务部批准，直隶省公署备案，公益会于农历七月十五日在西山成立，（事务所设在今中直九号楼）。朱自任会长，下设副会长；董事会中设董事，监事等职，其成员大都是在海滨有别墅的中国上层人士。七月十五日晚上，公益会在莲花石举行鸡尾酒会，并邀请石岭会、东山会等有关人员参加。会上，朱即席发表讲话，阐明了该会成立的宗旨是负责海滨的地方公益事业以及市政管理、建筑规划、税务收支、开发建设等项事宜，目的是“谋公共之健康，宜有高兴之娱乐”，“愿将使北戴河海滨为北方之模范自治村”^⑨。

公益会的成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企图霸占海滨的野心；限制了石岭会、东山会向西山一带的扩张，代表了部分爱国志士自主自强的心愿。公益会的成立，也标志着北戴河海滨的开发建设自此有了统一的管理、